

◀ (上接9版)

局:越是文化发达的地方,越是教育、知识水平高的人,就越容易倾向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也越容易有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和态度,生成对外国人民和文化的兴趣、理解和尊重。在非西方文明范围的国家,中国在美国的海外智识文化兴趣中首当其冲。这种东西除了体现在个人身上之外,还特别体现在大学和学术团体上。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哈佛、哥伦比亚、耶鲁都在培育对中国的知识上、文化上的兴趣和志向,这些东西进而会积累成情感、审美方面的东西,可以说都有各自牌号和风格的 intellectual internationalism,而中国在这种大学里的“智识国际主义”当中占据显要的,有时是首屈一指的地位。

当然这种东西首先是属于文化精英的。美国大众当中,排华,对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歧视和贬低,从历史上到今天其实一直都有。但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是在培养自己对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兴趣、热爱,提倡族裔和文化平等,开发对他者在文化、审美上的理解和欣赏,而且试图把这些精神要素推广到公众中去。这是同时涉及知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东西。对他者的欣赏、理解、善意和宽容,通过获得这些东西,你成为一个比没有这些东西的对方更好的人,这就是你的“软实力”。

再更进一步说,我们今天有足够的这些东西吗,我们是不是有培养这种东西的认真、自觉的努力?我们现在号称要大力扩充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要搞区域国别研究,但可能对当中很多人来说,关于别国、他者的知识的概念似乎只是一种要提供“对策”的知识的想法,里头“理解”的成分显然不够,或者说对“理解”的理解不够;是那种没有人文历史眼光的知识,是没有对人和文化的理解的硬生生、干巴巴的“知识”;而且最糟糕的,是这方面的意愿不够。

吴浩(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最早认识徐老师的时候是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浮生三记》。徐老师讲到他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实习的时候,登临我的老家——徽州休宁县的齐云山,在那儿饱览山色、畅饮山泉之余,还意气风发地在石壁上题写诗句,其中两句是“它年若显凌云志,跨鹤寰宇当再还”。

当时,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作品《上学记》刚刚出版,我也在从事出版的工作,就一直鼓动

徐老师写自传。他这么传奇的经历——上大学之前一句英文都不会,到后来在哈佛大学等世界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了多部英文学术著作——无论是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徐老师当时刚到港大,很忙,无暇写专书,我就给他在我主编的《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上设立“浮生杂记”的专栏,徐老师就一篇一篇地写。两三年前,徐老师给我发了邮件,说他在哈佛终于把这本自传写出来了。《边缘人偶记》是他第一本用中文写作的作品。

杨钊(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我现在正在关注和从事中国人留学美国史的研究,像留美幼童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很新的课题,前人已经做过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国琦老师运用“共有的历史”这样一个解释框架,使这个传统的留学史题目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而且他提出的解释框架,能够让大多数从事留学史研究的学者使用,包括庚款留学、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这样一些传统而重要的留学史课题,都能解读出全新的意义。

这两年中国史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就是全球史、跨国史和国际史研究。现在很多史学论文,包括很多学术会议,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都要冠以全球史、跨国史和国际史的名目。但是,真正能够运用这方法做出实实在在的具体研究的,在中国学术界还是极为少见。徐老师这本书为中国有志于从事跨国史和国际史具体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本。

我有责任重新梳理中美关系史

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共有的历史”,而这本书的写作及问世本身就是一个共有的历史。在座各位中,我跟袁明、大勇两位交往很早,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四年了。三十四年看起来很长,但是在历史长河当中是非常短的瞬间,回首三十四年以来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我个人是百感交集,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写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和动机。

2008年和2009年,我躲在哈佛写作《一战中的华工》,英文叫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当时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传奇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鼓励我写完此书后,可写一本新型中美关系史。我当

时在美国生活差不多有20年,深深感到当时的中美关系正悄悄发生巨大变化。在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在西方,G2、“中美”(Chimerica,即中美共治)的说法,就是在那时候横空出世。当不少美国人感叹美国在衰落时,一些中国人也认为风水轮流转,现在是中国人的天下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切身感受到中美关系正发生逆转。

其二,费正清(他是入江昭老师的老师,所以算是我的太老师了)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与中国》。1948年是国共内战,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冷战方兴未艾,可谓在中美关系转折的关头,费正清想指点迷津。60年后,中美关系再次发生巨大变化,作为学者,我有责任重新梳理中美关系史,分析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交往史。所以我这本书的一个野心就是上接费正清,一个甲子后写出新时代的新的中美关系史。

其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侧重政府和“冲击与反应”模式,我则有一个企图心,建立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即集中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共有历史。从政府的层面回到个人,从外交层面回到文化层面。所以,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突破,就是向费正清所谓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和费正清的学生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模式挑战,强调共有历史的重要性。

这本书也是我用英文撰写的所谓“共有历史”三部曲的第一部,除了2014年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外,2017年初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写了一本《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今年5月1日开始到年底我就躲起来,集中精力,力图完成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 *Idea of China*。我过去写过国际化历史三部曲,书中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什么?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概念?我的共有的历史系列尤其最后一本则正面回答和解释 *Idea of China*。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殊途同归。现在这三本书力图从各种不同的题目、角度分析、研究我心目中的共有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到刚才剑鸣说我会讲故事。用故事说话,确实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诉求。我之所以选三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120个留美幼童和国际体育与中美关系这六个故事,就是想在全面的档案的基础上,给读者讲六个案例。

(下转11版) ➔

从历史中找到丰富的线索

陈昕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一些新的迹象表明两国之间的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和失控的危险,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也在加大,因此,如何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把战争的风险,成为了人们既关心且担心的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新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试图通过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解读和近500年来发生在大国之间冲突的分析,来提醒中美两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2500年前,古希腊人修昔底德写下了其不朽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讲述了雅典与斯巴达是如何从最初和平地管控双方的战略性竞争,到最后走到毁灭性战争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修昔底德认为,这场战争无法避免的真正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2015年9月,艾利森在其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将导致这一战争的根本性原因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当一个崛起大国威胁到守成大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艾利森在他的这本新书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过去五百年,发生在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及权力更迭,他列举的16个案例中有12个以战争告终,仅有4次幸免,并简要介绍了其中5场战争发生的路径。这是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中美关系近期发展所作的铺垫。

对于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说有许多批评和不同意见。对此,艾利森在书中附录2中列举了7个“稻草人”,并加以回应。其实,最典型的批评是,在核时代,中美之间的战争会摧毁这两个国家,使人民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两国领导人都不能愚蠢到通过战争来解决冲突。不过阅读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知道雅典和斯巴达的领导人,如伯里克利和阿基达马斯二世都是智者,都知道并警告战争意味着灾难;但对利益的渴望、对抗的加剧、国内政治矛盾的抬头、荣誉感的发酵、情绪化的狂热,尤其是守成国的恐惧和崛起国的自信,使得双方到后来都认为

暴力是伤害最小的选择,于是战争就降临了。任何智者到那时都很难抗拒这种逻辑和选择。从艾利森列举的最近五百年那12个用战争解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关系的案例,可以看到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修昔底德发现的国家竞争关系脉络均表现得很明显,无一例外。“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的发作导致战争。

本书的核心是讨论中美关系是否已经陷入或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也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此艾利森的回答是很谨慎的。他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价值观与传统等多重角度分析了中美关系在经济摩擦、地缘战略、政治分歧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当然他还是认为这些问题不太可能导致战争,不过他告诫,通往战争的道路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多样。

艾利森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如果两国领导人都能研究历史中成败的经验和教训,那么他们将找到丰富的线索,并能够从中形成一个在不发生战争的状态下满足各国基本利益的战略。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是因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都在行动和态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4个案例中的有关国家成功跳出陷阱、通往和平的12个方法。此外,还提供了美国可能的千种战略选择,即:容纳、削弱、通过谈判获得“长和平”、重新定义关系。

全世界都注意到,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极力想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2年,中国向美国提议,共同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和美国将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并寻求在新的领域(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开展合作,以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又向奥巴马总统提出中美必须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过,后来美国有些势力甚至以零和心态来看待中美关系。如何使目前局面得以控制而不至于进一步恶化,对中国而言,还是要处理好我们的民族复兴与美国要“再次伟大”的关系,在明确和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尽快找到与美国达成协议、解决争端的平衡点,全力避免走向战争,同时努力寻找中美之间新的合作空间。这里需要大智慧,有所弃才能有所得,大智才能大勇。